

·专论·

编者按:建设高校智库,不仅是地方大学在新形势下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客观需要。然而,高校智库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举步维艰。苏州大学在推进高校智库建设中,勇敢推倒“物理围墙”,率先成立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中介机构“苏州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简称“东吴智库”),有效整合校内外、国内外优质师资,根据苏州、江苏乃至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与地方政府、行业联系,探索出“以合作平台为载体、以项目投放为路径、以成果共享为目的”的校地、校企合作双赢机制,增强了学校建设东吴智库的自信。为此,本刊转发我校副校长田晓明教授在2014年第3期《群众·决策资讯》的文章,以飨读者。

高校在智库建设中应有大作为

田晓明

无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还是高校自身生存、发展之主观诉求,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进程中,高校都应该有所作为,努力探索加快高校智库建设的路径和方法。

高校智库建设举步维艰

高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但不同体制条件下的高校,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高校必须直面很多现实的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保守。保守的思想认识来自两个方面: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深处,认为高校远离社会实践,高校教师习惯于纸上谈兵,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对来自高校的意见或建议不屑一顾,甚至带有几分轻蔑。在不少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心目中,高校是神圣的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必须保持与世俗社会的距离,高校教师应恪守传道、授业、解惑之职责,面对现实问题,狭隘地将“是什么”、“为什么”视为己任,而将“怎么办”抛向了政府官员。这两种保守认识,导致高校学术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和分离。

第二,运行机制制约。运行机制的制约同样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政府运作机制看,由于高度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机制,使高校应有的独立、自主、批判精神等优秀特质被无情地消解甚至埋没了,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和博弈过程中,高校逐渐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从高校运行机制看,由于高校分类、分级等人为的“标签化”管理模式

干预,高校管理者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甚至背离学理,不遗余力地追求一些建设指标(如学科、项目、论文等级别和数量等),使高校与真正的学术以及社会需求渐行渐远。

第三,形式主义作祟。从政府层面看,一些官员为了彰显其政绩,便以“政产学研”名义与高校合作,奠基、挂牌、剪彩等场景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合作程式,但从内容看,却鲜有实质性的成果产生。在其眼中,高校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标签”或“招牌”而已。从高校层面看,一些高校管理者根本没有从科研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制度设计等方面给予“社会服务”以必要的政策性保障,而是依然故我地重复“昨天的故事”。于是,便有了一种奇异乱象:一方面一些高校管理者如数家珍般地孤芳自赏一些数据或指标,另一方面教师却沉湎于书斋而无暇他顾。现实中的高校社会服务之形象,要么是部分教师“跑单帮”或友情客串,要么是政府和高校的官员们心知肚明、徒有虚名的



集体亮相而已。

不难理解,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高校智库建设可谓是举步维艰。

打通高校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物理围墙”

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既需要精心守护精神家园,又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打通高校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物理围墙”。

高校的本质在于文化,而文化具有开放性和保守性两大特征。就其保守性特征而言,高校必须坚守“精神家园”,在

本期要目

- 高校在智库建设中应有大作为
- 东吴智库成果《打造“水乡明珠、生态黎里”的调研和思考》获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重要批示
- 国土资源与城乡规划研究把脉城市发展
- 我校入选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助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 教育部重大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立项 为地方政府的政策优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文化建设·



合作双赢机制,并将这种富有成效的运作机制以制度形式给予表达,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学校事业发展。

学校成立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中介机构“苏州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简称“东吴智库”),藉此有效整合校内外、国内外优质师资,根据苏州、江苏乃至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政府、行业合作组建研究平台(如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建“地方政府与城市治理”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与苏州市委组织部共建了“苏州党建研究所”、与新加坡邦城规划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共建了“苏大·邦城未来城市研究中心”等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积攒,增强了学校建设东吴智库的自信。

首先,突破了地方财政体制的束缚。作为省属高校,苏州大学尽管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但不属苏州财政体系覆盖之列。建立东吴智库,与苏州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研究平台,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和突破。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以项目形式给予经费支持,很大程度上弥补和缓解了学校科研经费之不足,真正有效践行了“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以合作促双赢”的办学理念。

其次,促进了优质科研资源的整合。对现实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人才的协同与合作。东吴智库的诞生,不仅有效打破了学科、专业间壁垒的制约,而且成果挣脱了学院(部)之间行政壁垒的桎梏,使这种优质人力资源的整合成为可能。教师从远离现实、凭籍个人兴趣爱好的“书斋式”研究,开始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从原先“跑单帮”式的横向科研工作样态正渐渐演变成“跑马帮”模式。在这场变革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校,对文科服务社会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潜移默化中,教师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问题意识得到了提升和强化,思想碰撞、学术交流的风气和习惯日渐形成,大大提高了科研能力和科研质量。

再次,提升了学科建设水平。问题来源于现实,而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研究课题,进而提升纵向科研的学术水平,这是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收获,东吴智库的基本经验就是:将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将现实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区域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主动介入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指南的制定工作。事实证明,随着“东吴智库”的建设,苏州大学学科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这种坚守中传承文化,使学生获得文化启蒙、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鼓励学生文化创新。高校可以没有“物理围墙”,但不可没有“精神围墙”,高校必须小心、审慎地维护与社会的距离。如果高校堕落成为社会的“技术服务站”和“员工加工厂”,这不仅是高校的黄昏,也是人类精神的日落。从文化的开放性特征看,高校又必须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文化。但是,这种服务社会的开放性特征要求,应当体现为高校自发、主动、自觉的行为,而并非政府的强势介入和干预而导致的被动行为。可以说,寻求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办学者的共同心声。

传统管理模式使得中国高校发展模式整齐划一而失去应有的个性与特色。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政府对高校实行了分类、分级管理,人为地给高校贴上“地方”与“直属”、“211”与“985”等“标签”,这种“标签式”的分类、分级管理模式,非但没有达成高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等良好初衷,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权力对高校的干预,严重背离了学术发展规律。

急于求成的为官心态与“为政一届、造福一方”的观念交融于一体,衍生出种种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从政府官员视角看,高校与机关、企业无异,“政府办高校”这一主体意识决定了其行政管理的基本路径和方式,很少关注高校之本质特色和学术之发展规律。古人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偏离了高校本质和学术规律,其

办学结果必定令人失望。从高校管理者层面看,由于政府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影响,高校管理者在世人眼中早已不是学术的象征,而成为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其对“政绩”的考量和追求也与真正的学术渐行渐远。

另外,现在有很多教师的科研工作属于远离现实、凭借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书斋式”研究,即便偶尔有一些横向研究任务,也多是一些“游离式”、“跑单帮”的单干。究其原因,则是高校学术考核和评价的偏差。长期以来,高校科研管理中普遍存在着的“重纵向、轻横向”倾向,在职称评审、资格认定、考核奖励等人事管理环节中,高校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论文(著)和成果奖励等“纵向”指标给予很高甚至绝对的权重,而忽视甚至无视社会服务性指标。基于此,教师便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一些狭隘的意识。很多教师认为,社会服务只是“贴补家用”的一种无奈之举,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因而很多教师对社会服务怀有一种不屑甚至排斥的态度。显然,高校学术评价的认识和行为偏差严重制约着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

东吴智库:在改革中起步

苏州大学具有开门办学的优良办学传统。承继这一传统,苏州大学勇敢推倒“物理围墙”,密切与地方政府、行业联系,探索出“以合作平台为载体、以项目投放为路径、以成果共享为目的”的校地、校企

·生态文明建设·

东吴智库”成果《打造“水乡明珠、生态黎里”的调研和思考》

获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重要批示

6月30日，东吴智库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方世南教授等的报告《打造“水乡明珠、生态黎里”的调研和思考》刊发在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编的《调研通报》第7期上，并报市领导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高度重视，并于7月22日作出重要批示：“这篇调研报告写得很好。江南古镇体现了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护、开发古镇一定要传承文化，尊重自然，真正实现古镇生态可持续发展。希望吴江区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黎里作为江南“四里”之一，与已经成为江南古镇的一张名片的同里古镇在同一区域内，如何挖掘黎里古镇的千年文化底蕴，形成与同里古镇

错位发展和良性竞争态势，促进同城古镇的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使这个千年水乡古镇成为江南古镇的又一张历史名片，科学确定黎里古镇发展定位的思路尤为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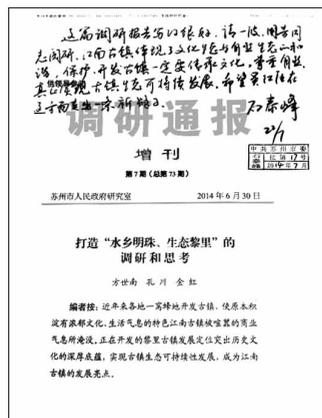
方世南教授等指出，黎里古镇的特色定位必须建立在总结凝练黎里特有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基础上。“水乡明珠、生态黎里”是黎里古镇发展的特色提炼。做好“水文章”，打造“水乡文化品牌”，使水乡文化特色名副其实。黎里古镇应该把古镇的原生态作为重大个性特色，围绕古镇原生态进行主题构建和整体规划，使得古镇生态既具有原滋原味的历史韵味，又符合绿色生态发展的时代主题，形成具有独特亮点的古镇品牌。

黎里古镇要处理好古镇发展与商业开发、古镇文化

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坚守古镇历史文化的底蕴，让古韵今风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突出生态休闲文化的主线，形成娴静小憩的主题，彰显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色，保持自己在众多江南古镇中应有的贵族气质和高雅地位。

方世南等教授认为，围绕黎里古镇原生态文化和自身独特的优势，黎里古镇原生态文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打造以柳亚子纪念馆为主题的教育文化区；二是打造以弄堂为主题的民俗体验区；三是打造以禊湖道院、鸿寿堂、洛雅草堂、端本园、写韵楼、新咏楼、周宫傅祠堂等建筑为主题的历史建筑街区；四是打造以小桥驳岸为主题的休闲观光区。

近年来，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结合专业背景，致力于



打造“东吴特色”，以探索“苏南实践”为基础，以“苏南问题”为导向，以“苏南风格”为特征，以形成“苏南学派”为使命，以“重大矛盾与关系”为主题，以专业化研究为手段，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拓展苏南道路、凝练苏南特色，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经验。充分发挥了我校“立足苏南，服务江苏，辐射全国，影响海外”的高校社会服务职能。

国土资源与城乡规划研究把脉城市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城镇外延的不断扩张，土地规划与使用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州作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作为较早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对土地规划与使用等问题也作了夯实的研究，并在相关指导政策文件基础上制定了《苏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为苏州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其面临经济发达地区遇到的相关土地政策与

规划问题提供实践指导。

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国土资源与城乡规划研究所所长严金泉教授及其团队围绕“土地政策”和“土地规划”等主题对苏州市相关土地问题作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首先，该团队紧密联系“土地短缺”实际，就苏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详实的前期研究，分析了指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提出应以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保障发展，同时尊重规划分配指标的权威性为原则，制定对策措施，化解矛盾，使规划最终成果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其次，该团队针对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和十分紧缺的土地资源的矛盾开展长期研究，基于对苏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历程的梳理，对苏州现有的土地机构和布局的分析，结合国家政策和地方实际，从“结构优化”“布局优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三方面剖析了苏州城镇化进程中

所面对的土地节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解决当下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约的问题，为统筹城乡结构，实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现实参考建议。最后，严金泉教授及其团队将成功实践的“苏南经验”跨省市、跨区域应用，取得显著成效，并起到了辐射引领作用。

据统计，严金泉教授及其团队承担完成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2项，亚洲开发银行委托项目1项，江苏、江西两省市、县(区)的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与预算编制60余项，省投资土地开发整理、整治项目80余项，项目一次性通过率达到100%；承担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基本农田划定、土地整治规划、工程竣工测量等项目200余项。其中，“江西省不同地域条件土地开发整理工程模式及应用研究”成果获得国土资源部2011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文化建设·

我校入选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助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近日,省文化厅公布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我校以李超德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功入围。

苏州地处东南沿海太湖之畔,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双璧于一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园林、戏剧曲艺、工艺美术均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她是文化部、财政部确定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三个地区之一,也是“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分中心所在地,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已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成就了

苏州大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优势地位。2000年来,苏州大学以关注人类文化遗产、关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探索社会转型期高校在文化与遗产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理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学科建设和发展,加快推进系统、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传播体系建设,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与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一支非遗研究重要的学术队伍。目前,该团队有教授16人、副教授10人、高级工艺美术师2人、讲师8人。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工艺美术、服

饰艺术、传统书画、评弹艺术、昆曲艺术、文物保护、古典园林建筑等方面。

2006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针对文化遗产事业在教育、保护、研究、传播等方面的薄弱环节,苏州大学整合了艺术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在文化遗产研究、教育、开发和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学术力量,前瞻性地成立了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系统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与人才培养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填补了以往教育中长期被忽视的文化遗产认

知之空白,也以此形成学校鲜明的办学、研究特色。在整合各方面资源进行机制探索和实践的同时,真正建立起了一个文化遗产研究、开发、传播和创新实践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充分彰显了高校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对我国同类型院校的文化遗产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与带动作用。

此次成功获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中心将在更高的平台上,有效整合校内外学术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进科学保护,促进传承发展。为苏州、全省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我校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东吴智库特约研究员鲁枢元教授获鲁迅文学奖

近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在中国作家网揭晓,共产生34篇(部)获奖作品。其中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各5篇(部)、文学翻译4篇(部)。我校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东吴智库特约研究员鲁枢元教授《陶渊明的幽灵》获文学理论评论奖。

创立于1986年的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今年是该奖的第六次评选,此奖每三年评选一次。

鲁枢元教授此次获奖的作品《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该书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了古代诗人陶渊明的思想与成就,借助于对他的研究,鲁枢元教授突破性地开辟了生态批评广阔的道路。鲁教授在“后记”中说,运用生态批评重新审视陶渊明,涉及古代文学史和诗歌研究,他是“外行”,只能“一边补课,一边写作”;可按照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与一些科学史家的观点,对于一些拥有了成熟规范的学科而言,规范的突破,总是由“外行”开始的。《陶渊明的幽灵》还证明了,对一个过去的、重要的作家研究,可以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第一辑)

获“2013 苏版好书”奖

日前,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中红教授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第一辑)获得“2013苏版好书”奖。该奖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和江苏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评选,64种“2013苏版好书”图书名单于7月7日在省新闻出版局官方网站发布。

丛书对包括Cosplay、黑客、恶搞、御宅、网游、拍客、迷族(粉丝)在内的七种主要青年亚文化形态进行了现象梳理和理论分析,形成了马中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国内有着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意义。文化研究专家陶东风教授称之为“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和敏锐学术眼光的研究成果”。

我校出版社以这套丛书成功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该丛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华读书报》、《深圳特区报》、《东方早报》、《苏州日报》等主流媒体均发表了相关书评和专访。

这套丛书从2009年开始策划,经过三年时间最终完成。丛书写作团队中既有教授博导,也有青年骨干,他们在这套丛书的撰写中努力寻找到学术研究与社会接受之间的平衡点,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完成这套丛书之后,该团队还出版了《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3)》、《网络那些词儿》等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相关的著述。据悉,该团队正在进行《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第二辑)的写作。

·政治建设·

教育部重大项目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立项 为地方政府的政策优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评审结果,我校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金太军教授领衔申报的“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获批立项,这是我校第二次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是教育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资助力度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项目之一。其定位于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已成为衡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

金太军教授领衔的团队,队伍整齐,整体学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等研究方向形成了显著优势与特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与重点课题6项,一般或青年项目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5项,其中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06JZD033)获得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达到了申请免于项目鉴定的条件。高质量地完成了国家“211工程”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生态型区域(苏南)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2011年金太军教授牵头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管理”、“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先后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江苏高校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成为江苏唯一以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优势学科和协同创新中心。

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服务于实践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双模式”变迁期间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挑战,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创新治理的关键一环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稳定和谐则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前中国进入到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社会转型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和谐因素在增多,通过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建立与完善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因此,如何理性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问题,特别是探索新的、符合时代要求和特点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推进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多元参与与协同创新体制、绩效评估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持续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性作用愈发关键。在此基础上,社会治理创新特别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被提出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其对于社会和谐稳定良好局面的创设与长效机制构建的关键性作用更是被寄予厚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语义变迁,得益于学术界以“社会管理”为主题的长期理论研究的深厚积淀,更是党和政府长期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实践开展的现实成就与迫切诉求。因此,这一变迁本身就蕴含并彰显着创新社会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此,如何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入理解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语义变迁、并细致剖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权能配置、运作机理逻辑、具体理论内蕴与实践外延等关键内容,构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社

教育部司局函件

教社科司函[2014]178号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批准下达201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通知

苏州大学:

你校金太军教授投标的201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第29号招标课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经我部组织专家评审中标,现正式批准立项。

项目首席专家:金太军

项目批准号:14JZD029

项目批准经费:80万元。第一次拨款48万元。经费由我部财务司拨至你校计划内财务账号。第二次拨款待项目中期检查通过之后拨付,剩余经费待鉴定结项后拨付。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2017年

项目中标学校和首席专家应按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严格履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研究计划合同书》,瞄准国内和世界先进水平,认真组织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和跨地区的联合攻关,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力争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2014年9月11日

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机制,并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与社会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微观基础,最后通过对虚拟社区、边缘社区、环境事件等具体问题的场域研究以及瓮安、孟连、陇南、通钢等典型实践的案例分析,提高对现实问题的阐释能力,以此来检验和提升理论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以便为地方政府的政策优化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从而为提升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水准,构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作出积极的贡献,是本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近年来,我校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积极整合学术资源,以高层次、重大与重点课题为抓手,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不断提升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在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步尤为显著。

·权威视点·

要特征是：在技术上主要靠引进，或在研发上跟踪模仿国外先进技术，而不是主要靠自主创新；在产业上主要靠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或外包，而不是主要鼓励企业进行自主投资或者自主创业；在投入上主要依靠低级的、一般性的生产要素，而不是高级的、专业化的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生产加工环节；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外需而非内需拉动，出口导向成为主要追求的发展目标；在比较优势上是用低成本要素而非依靠生产率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进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苏州必须率先突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战略，在城市发展方面，必须要依靠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加快城市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政府必须实现从创造财富向创造环境的转变。

其次，以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主要承担“就地城镇化”功能，促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协同发展，并承接中心城市外溢的功能。小城镇化为主的就地城镇化也构成了未来苏州城镇化的新战略。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过“就地城镇化”，但是今天重新提出“就地城镇化”的概念与上世纪80年代是有区别的。这种就地城镇化更多地表现在“网络化”空间结构中的“就地城镇化”，不是封闭的“就地城镇化”，只有在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中才能真正实现“就地城镇化”。这种“就地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即区域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区域化为主。苏州虽然从总体上讲，仍然处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处于相对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使得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这也为“就地城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了以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空间扩张和发展，充分发挥了大城市的规模和集聚效应。但进入到新阶段，苏州地区农村结构调整和农业的现代化速度加快，重新提出“就地城镇化”的概念有重要意义，它并不是试图否认以中心城市为主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是基于信息化时代要素的流动性加快，实现集聚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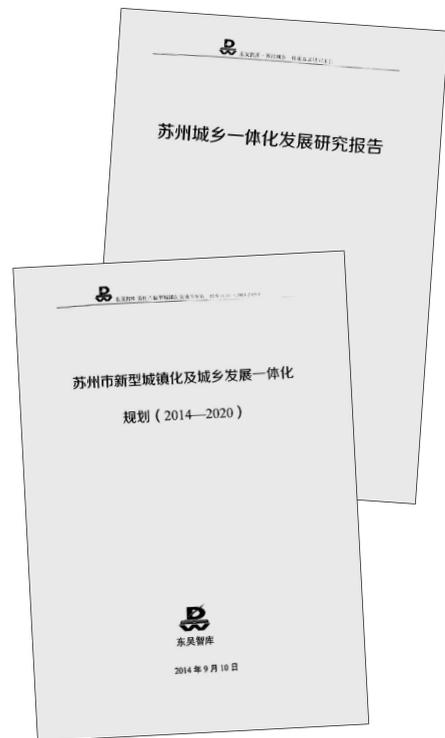
应和扩散效应的统一等，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不是重新回到以前的“就地城镇化”概念。“就地城镇化”以小城镇为载体，破解城镇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承接一些中心城市功能外移，缓解中心城市的压力。

这两种类型的城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构成苏州新型城镇化的完整内涵和发展趋势。其内涵在于以“双基点”城镇化战略为指导，构建合理的城镇结构体系。目前，苏州提出“1450”的城镇体系格局，主要是指“一个中心城市”，四个县级市，还有50个中心镇，另外还包括1500个古村落。这个城镇体系是否合理，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毫无疑问，长期快速发展和进入城乡一体化新阶段，要求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必须相应变革，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三、“双基点”城镇化： 苏州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苏州城乡一体化虽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也正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破解是进一步深化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着眼于未来苏州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我们认为，“双基点”城镇化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苏州未来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首先，“双基点”城镇化是化解苏州当前社会发展矛盾的战略选择。“就地城镇化”作为苏州城镇化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改变单一以城市为载体城镇化政策的局限性，在具体政策上对小城镇和农村进行倾斜，有效地改革现有金融和公共财政体制，推动小城镇的功能完善和提升。也才能有效地解决苏州“三集中”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实现就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以城市作为城镇化的载体，是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或者解决这些问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地城镇化”并不排斥以城市为主“创新驱动”的功能性城镇化，只有通过功能性城镇化才能有效地实现城市内部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也才能实现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苏州城乡一体化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战略结构问题，是有效地确立“就地城镇化”和“功能性城镇化”二者之间协同发展。



其次，“双基点”的城镇化协调共生，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和多维发展目标。如果割裂“就地城镇化”和“功能性城镇化”二者的关系，无益于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治理和生态等问题。同时，双基点城镇化战略更有利于城乡之间产业合理布局，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协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和生态转型。促进苏州城镇化进程中空间结构朝着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双基点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有利于破解城乡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金融、财政、土地、基础设施、产业等政策方面给与小城镇和农村更多地倾斜，推进政府在金融和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化解基层乡镇政府的债务危机。

第四，“双基点城镇化”战略，能够更好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苏州很多小城镇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基础实力雄厚，很多小城镇经济实力和人口集聚实际上已经达到中小城市的实力，对要素具有一定的集聚能力，能够承接中心城市产业等功能的疏散和外溢，促进城乡之间合理的分工。

综上所述，苏州城乡一体化过程是推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大转型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施“双基点”城镇化战略，通过相应财政、税收等制度变革，推动城镇化空间格局从不均衡走向相对均衡，这是苏州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权威视点·



胡鞍钢

编者按:智库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必须体现其“特、专、新、优”地特点,才能在参与全球智库的竞争中形成中国学派、中国风格。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全球智库竞争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体,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贡献、减少贫困贡献、和平发展贡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还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广泛参与全球智库竞争,为世界作出更具独创性的、重大的知识贡献和思想贡献,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

建新型智库是提升软实力的战略需求

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按8大类战略资源、18个量化指标计算的综合国力,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5.60%,提高至2010年的14.39%,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4.32倍缩小至1.22倍。这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强国,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还不是真正的软实力大国,与美国的软实力差距相当大,尤其是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我们不仅需要在中国问题上,而且需要在世界重大问题上发出更大的发言权,即发出“中国声音”,有“中国主张”、“中国议案”。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既是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适应中国不断提高世界地位与作用的客观需求。

当今中国社会各类思潮芜杂,亟须一流大学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正确观点和深刻思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对智库的知识需求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我们及时、适时提供更具指导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政策建议。为此,中国的名牌大学要有意识地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不是一

般的智库,而是高端智库;也不是仅在国内有影响的智库,而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智库。

尽管中国大学智库成立时间比较晚,发展起点比较低,还处于初创阶段,但是我们能够利用后发优势,集中智力办智库,不仅可以学习并快速追赶西方智库,而且还会因为中国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化、专业化、知识化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超越西方智库,勇于同他们进行知识竞争、国际话语权竞争。

中国新型智库:特、专、新、优

智库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将中国发展和变革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特”,要有中国特色。“智库”是“智者之库”。它是一个国家的智者集聚之地,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国内,我们是“国家智库”,不是“私人智库”,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智库”,不是“美国智库”,要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自主发出中国话语权,是“南方智库”,不是“北方智库”,要自觉代表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强力发出南方声音。

二是“专”,既要专业化,又要职业化。这是一流智库最重要的特点。作为专业化,就是某一领域权威的专家,能够与同行竞争和对话,也能够为同行所认同和尊重。作为职业化,就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长期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做到融会贯通,不仅高出一筹,还要独树一帜。无论是专业化还是职业化,都是时间的增

函数,需要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智慧资本的不断积累、持续积累、长期积累。

三是“新”,既要创新理念,又要创新组织形式。不拘一格办智库,集思广益谋创新,集学术智慧、人民智慧、国家智慧之大成,还要集历史智慧、世界智慧之大成。

四是“优”,不断创新质量高、影响深远的思想和智慧,及时提供高水平、可行性的发展思路或政策方案,不断发表有深度、有影响、有标志的优秀学术成果、代表作。

概括地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作用是:两个服务,即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和国家;两个一流,即做中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智库;两个贡献,即为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知识和思想。

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中国不是“大师(个人)”的时代,而是“智库(团队)”的时代。智库不是“个体”是“集体”,不是“个人”是“团队”,那么,集体效率优于个人效率,集体知识优于个人知识,集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

新型智库要扩大四大影响力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智库本身还需要扩大国内外影响力。这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影响力,这要求智库在国内外最好的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刊物上不断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要采取有力措施,组成团队,选择前沿课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是政策影响力,就是以学术期刊为平台,持续扩大智库在高层决策界的声音,建立起学术界和决策界之间的信息桥梁,发出智库的声音。第三是社会影响力,智库要主动与主流媒体合作,成立各种形式的写作小组,有针对性地发表深度而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取决于其对国家有关重大决策的实际影响和长远影响。第四是国际影响力,智库要代表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学派,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与竞争。

中国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沃土,我们要深深扎根其间,每天细细地吸收这沃土中的水分和营养,才能培育出参天的学术之树。我们还要通过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意识地将学术的种子播撒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当代中国研究更加深广,使“中国学派”英才辈出,使“中国风格”蔚为大观。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第582期)